

· 都 · 文 · 化 · 丛 · 书

天桥

梦断

——电视剧《天桥梦》章回故事



主编 黄宗汉
编著 赵其昌

都文化丛书

编著 赵其昌



梦断天桥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尤开元
装帧设计:曹 春
技术编辑:马 杰 施明珠
责任校对:施明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天桥/赵其昌编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0
ISBN 7-5060-0801-7

I. 梦...

II. 赵...

III. 曲艺-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833 号

梦 断 天 桥

MENG DUAN TIANQIAO

赵其昌 编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60-0801-7/I·71 定价:19.50 元



本书运用传统的曲艺说唱形式，叙述了天桥著名艺人程天韵和红玉莲富有传奇而又曲折的爱情故事。其中既有父子不能相认，兄妹而又相爱的悲剧情节，也有仗义侠胆，刁钻奸猾的天桥人物众生相。

本书的说词情节跌宕，唱词、曲牌五彩纷呈，两者珠联璧合，较完整地体现了京味文化的精粹，展现了老北京天桥的风俗人情画卷。

策划 张秀平
主编 黄宗汉
编著 赵其昌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灿炽 邓友梅
陈建功 舒 乙



京都文化丛书

之

梦断天桥

编写说明

首都北京是驰名中外的文明古都，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水甘土厚，民风淳朴，素有“首善之区”的赞誉。

《京都文化丛书》是黄宗汉先生主编的具有浓郁“京味”特色的系列丛书。其内容广泛，包括北京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学艺术、风俗人情、民间曲艺、名人传记、戏曲艺苑、影视丛谈、社会生活、历史掌故、传说故事等雅俗共赏、颇有新意的作品。既以抢救与弘扬京都文化遗产为己任，又为发展和繁荣京都文化事业而做出新贡献。希望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关心和支持。

序 言

王 松 声

去年,大型电视连续剧《天桥梦》的总策划人黄宗汉先生持贾楠先生根据电视剧《天桥梦》台词整理写成的《梦断天桥》文学故事与我商谈如何试用曲艺形式予以再创作问题。

天桥是老北京平民文化的中心,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深受北京人民的喜爱。我看了《天桥梦》的录像,感到该剧的编导者正是沉浸在老北京平民文化的氛围中,才创作出这部反映北京平民百姓思想感情的电视剧,它散发着老北京的泥土芬芳,沁人肺腑。

我自北京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市文化主管部门工作,对天桥作过一些调查了解,并且有过改造老天桥的梦想。由于“知之深,爱之切”,我觉得《天桥梦》一剧所显示的内容,不仅是讲了一个天桥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而且是编织了一个几代北京人所寄托的平民文化的梦!

贾楠先生整理编写的文学故事《梦断天桥》取舍精当,文采洋溢,叙述故事的笔调,带有很强的抒情性。尤其是对主人公程天韵先后与四位女性的感情纠葛,描述得非常细腻动人。四位女性在爱情的表达上,有的委婉,有的柔韧,有的炽烈,有的纯稚,写的颇为鲜明。由于《天桥梦》是一部以情动人的戏,倘加工成曲艺,若干情节可以用唱段表现,因此我向黄宗汉先生建议,以改成一部章回体说唱大书为宜,并推荐了北京曲剧团编剧赵其昌同志来完成此项任务。赵其昌原在北京市房管局工作,业余酷爱曲艺,文学功底深厚。自1952年起即创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后调北京曲艺曲剧团任专业创作人员。他熟悉多

种曲艺形式，写的作品不仅能说能唱，并有可读性。早在1963年《诗刊》即有文章称他的作品为“可说可唱的叙事诗”。我把这次加工大书的意图和一些设想与他一起切磋商讨并取得共识。赵其昌同志根据我们共同商定的总体艺术构思，把适合演唱的部分加工成京韵、西河、乐亭、梅花、奉调、滑稽大鼓、单弦、拆唱八角鼓、联珠快书、北京琴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新梅花调、时调小曲联唱、评弹开篇、二人转、快板书、山东快书等十八种形式，共四十二段。为使韵脚变化多彩，运用了江阳、姑苏、人辰、发花、怀来、言前、一七、灰堆、乜斜、苗条、梭波、中东、由求十三道大辙及小人辰儿，小言前儿两道小辙儿，唱段之间运用韵文说白，启承衔接，观之娱目，听来悦耳。唱段儿与说白部分加在一起，共为四十二回，自成一部完整的大书。把这部名为《梦断天桥》的曲艺节目组织排练出来，或献演在甕氈，或播映于荧屏，或在农村广为演唱，则不仅与《天桥梦》电视剧相映生辉，相得益彰，而且也为振兴曲艺办了一件实事，实功莫大焉！

1996年4月于北京

老北京天桥的平民文化(前言)

黄宗汉

一、天桥平民文化的形成

天桥享誉海内外,被视为老北京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正如著名学者齐如山在《天桥一览》序中所述:“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

据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并三。有桥曰天桥。”这座桥是供天子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使用的,故称之为天桥。后来为展宽道路,天桥多次改建,至1934年全部拆除,桥址不复存在,但是天桥作为一个地名一直保留了下来。天桥的地域范围大致是桥南东西两侧和天坛、先农坛北部一带。张次溪所著《天桥一览》中说:“现时天桥的范围很广泛,附近的处所,都可以划到这个区域里来,没有清楚及详确的划分。”也就是说历史上天桥一带是一个有自身特色的区域,但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区划范围。

天桥一带在元、明两代就是郊游踏青走马之地。据明《帝京景物略》记载:“南抵天坛,一望空阔。端午日,走马于此。关西胡侍曰:‘端午走马,金元藉柳遗意也。’藉柳,今名射柳。”直到清末,据目睹天桥历史变化的齐如山先生描述:“兹就鄙人数十年前目所及见……当光绪十余年间,桥之南,因旷无屋舍,官道之旁,唯树木荷塘而已。即桥北大街两侧,亦仅有广大之空场各一,场北酒楼茶肆在焉。登楼南望,绿波涟漪,杂以芰荷芦苇,杨柳梢头,烟云笼罩,飞鸟起天。”说明从前

天桥一带是郊野，风景秀丽迷人。

天桥真正形成为繁荣的平民市场当在民国初年，据张江裁著《北平天桥志》记载：“民国元年，一月，香厂临时集会闭幕，香厂之商贩及诸卖艺者流，乃辗转据此为长久之场地，而与先时之天桥，益有雅俗之别矣。其后修筑水心亭，小桥流水，渐臻逸趣。自电车公司采天桥为东西两路总站，交通即便，游人日繁。趋时者，复出资争购地皮，兴建房屋，空地之上，相继支搭棚帐，或划地为场，租与商贩艺人，设摊设场。于是天桥之界限，已扩至三四倍，西北抵新世界，东北接金鱼池，西南至礼拜寺，东南则达天坛坛门矣。”天桥开始有戏园也在民国元年，当时有人在厂甸建大棚，演奏成班大戏，尔后迁至天桥，《北平天桥志》中说：“此实天桥有戏园之始，而同时继起者，亦比比云。”

到了本世纪 20 年代天桥有了进一步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新世界游艺场（也称新世界商场）和城南游艺园的先后建成，使天桥成为北京极繁华的地区。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九辑记述：“香厂自开办新世界游艺园后，整个街道整顿呈繁华景象……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两大综合大型游艺园相继开办，由于经营得法，很受观众欢迎（这种别开生面的综合大型游艺场所，在 20 年代的北京是罕见的）。”至 1936 年云游客写《江湖丛谈》时，书中说：“天桥市场地势宽阔，面积之大，在北平算是第一。”“经十数年之久，便成为今日平民模范市场也。”天桥因市场的兴起而繁荣发展，而这一市场，又是面向平民大众，集文化娱乐和商业服务为一体，文商结合，互为促进。它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天桥在它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天桥平民文化，因其生根于平民百姓之中，故虽历经沧桑，却能持久不衰。

二、天桥平民文化的特点

天桥平民文化所以有长久的魅力，是由于有自己的特色，大致可

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适应平民百姓的需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说：“天桥是北京最具有人民性的地方。”天桥市场是面向平民百姓的，为大众服务的，天桥卖的东西，是老百姓所需要，也买得起的，天桥的娱乐活动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也看得起的，这就是天桥生命力的所在。据1945年《中华周报》2卷10期记载：“天桥东边在每天早晨，真够热闹，有粮食摊，有干果摊，还有菜蔬摊、烟卷摊，简短截说，开门七件事，天桥东边的摊子上，样样都有，只要有钱，什么都不愁买不到。据说，天桥东边无形地已成为北京市场有力者的一环，百货杂陈，贩者云集。北京市一般生活必需品物价的伸缩，至少有50%系在这群买卖人的两条腿上。他们如果集团地休息几天，北京市的物价马上便有影响。”天桥是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因此即便在北京商业萧条时期，仍能生存发展，据1930年2月《北平日报》的《天桥商场社会调查》一文中说：“近两年平市繁荣顿减，惟天桥依然繁荣异常，各地商业不振，惟天桥商业发达……天桥无物无之。目下购物者多奔天桥，闻该处大布摊每日所收之款，竟有超过著名大布店者，近日鞋摊亦较鞋铺发达，谓该处为平市繁荣中心，谁曰不宜。”该文作者分析天桥，所以能够维持繁荣，除商品价格远较他处低廉外，并“有几层原因：(一)天桥地基宽大，容纳工商、游艺极多。(二)游人无需花钱购票，是以上下阶级俱全。(三)具有平民公园性质，买卖物品及闲游均可。”这就说明天桥这个大市场不仅是商业中心，也是平民文化娱乐的中心，文商紧密结合。

天桥的平民文化从人民生活中来，又回到人民生活中去。它以自己的文化形态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企求与愿望。天桥附近有灵佑宫、精忠庙等共十余处神庙，民间祭神和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是天桥一大胜景。灯会是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清人《凤城新年词》中写道：“才了歌场便买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在，灵佑宫前另结棚。”又《上元杂咏》诗中：“灵佑宫前市，鳌山万

树花。千金争孥价，卖入五侯家。”更对灯市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天桥附近有座江南城隍庙，马书田著《华夏诸神》记述城隍爷一年三次出巡，“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里。最前列为八面虎头牌，鸣锣开路。隔十余步为青龙白虎等二十八面大旗。再后为六十四执事仪仗，所执兵器有刀、枪、斧、戟等。接着是四郊农民的五十面大鼓的鼓队及诸百姓献给城隍的万民伞、万民旗等。之后为民间走会各种杂耍，如耍中幡、杠箱、五虎棍、高跷、秧歌、耍坛子、耍狮子、跑旱船等等”，这是天桥民俗活动中最精彩的画面。最初，祭神的表演，像耍钢叉开路等，是不准用来卖艺的，后来渐被突破，有些人为了糊口，祭神之后，就利用天桥的空场“撂地”表演挣钱了。至于城隍爷这位城市的保护神是哪一位神仙？经查考却是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源起于百姓们崇拜文天祥一身正气，宁死不屈，恭奉为神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拢络人心，封文天祥为城隍。揭去城隍崇拜的封建迷信外衣，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对城隍的神崇拜，实质上是对人的崇拜，老百姓把文天祥视为正气的化身，向他倾诉心中的不平，希望他能主持社会公正，审判处置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天桥的精忠庙是梨园行会所在地，戏曲艺人在这里聚会，与官场及各界人士交往。梨园行最讲义气，昆曲艺术大师韩世昌年轻时与报界先驱邵飘萍友好，邵飘萍因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被张作霖枪杀于天桥，韩世昌竟敢出面为他收尸，并隆重礼葬。“大兵黄”是天桥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一位艺人，他天天站在天桥撂地怒骂，激烈抨击当时官场的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嘻笑挖苦，淋漓尽致，大快人心，被誉为“天桥八大怪”之一。凡此种种都可以透视出天桥文化的人民性，可以清楚地从中看到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精神世界。

（二）市场高度综合密集。天桥市场方圆约20余亩，其商家、游艺场所和摊点多样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据1930年《北平日报》的一项社会调查称：“近由该管外五区详查，即天桥西隅已有商店二百余家，并有浮摊四百三十余家，每日以天桥求生活者，当在数千人

之上，天桥地方又岂可轻视哉。据对天桥商摊统计，布业七十九家，饭业三十七家，估衣八十三家，戏园大小九家，坤书馆七家，木器店二十一家，杂货店二十四家，煤商九家，茶馆三十家，镶牙馆八家，卜相棚十九家，席箔店三家，洋货店七家，酒店三家，纸烟铺四家，钟表店三家，茶叶店一家，以上皆为纳月捐领商照之正式商店；其余各项货摊二百九十一家，食品摊四十九家，游艺杂技摊六十二家，卦摊、药摊等三十七家云。”从这个调查中可以看到逛一趟天桥是很过瘾的，在这个商场里洋洋大观无所不包，有人说到了天桥可以看到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品尝百样吃食，从估衣到古董都可以买到，同类商品在几家商店同时陈列，顾客可从中挑选最称心如意的东西，就是看戏也是几家戏院子在打擂台，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挑着看，由于天桥市场的综合密集多样，使顾客和观众有更大的选择余地，适应了多元化的社会消费需求。

（三）开放竞争充满活力。天桥这块宝地，是个开放的大市场，谁有本事，谁就可以到这里来招财进宝。天桥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和艺人，北方几乎所有曲艺品种都在天桥落了户，不仅如此，日本的马戏团、俄国的大力士也到天桥来表演，天桥还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中，建成北京第一个大规模的室内游艺场——新世界游艺场。据1981年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论文《北京近代建筑历史源流》记载：新世界游艺场这座大型建筑是1917年由英商通和洋行设计，“园内各种游戏参酌东、西各国之法，精益求精”。这座大型游艺场，高7层，建筑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在这里除了中国的传统的节目表演外，还放映电影，演出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等文明戏。当时只有新世界游艺场是北京城建筑高度达到7层的大型西式建筑，这是天桥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新世界游艺场周围还形成北京最早引进西方文化的街区，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进行了交流融合。

在天桥这个开放的大市场里充满着竞争的活力，这是生存的竞争，顾客要看出个门道，吃出个味道，才肯掏钱。天桥的小吃，据调查

有115种之多,做得好的店家可用其姓氏作店名享誉乡里。1927年《晨报》发表的《天桥之一瞥》中写道:“天桥生意中有三王,即豆汁王、烤肉王和王八茶馆,皆为数十年来著名之人物。按烤肉一物,北京售者甚多,惟天桥地方独有其一,且其烤肉所有之铁篦子,实在与众不同。每至秋日往该处就食者,真是趋之若鹜。”这里说的清楚“与众不同”就是有特色,顾客就会“趋之若鹜”。天桥的王八茶馆,掌柜的姓王排行老八,故得名。《天桥之一瞥》中还写道:“北平这个地方,评书茶馆共有七八十家,王八茶馆,屋内宽阔,有三百多书座,为书馆之冠;说书先生挣钱最多的,亦属该馆第一。王八茶馆虽能挣钱,艺术要求高超,第一路角色能上的住一转儿(每两个月为一转儿,过期改换新角),第三、四路角色皆畏而不往。第二路角色亦常有磕出去做不到一转的。”这里也说的清楚,在天桥卖艺本事不行就得走人。正是这样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形成一种刻苦学练不断创新的风气,培育造就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艺术人才,还出了一拨又一拨的“八怪”,这不是什么官方评奖的命名,而是社会公认的美誉,这使天桥的平民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当然,天桥有好的、光明的一面,还有坏的、阴暗的一面。正如1959年9月老舍先生在《文汇报》发表的《天桥》一文所写的那样:“事实上,在解放前,天桥是北京最混乱与黑暗的地方……那里的恶霸与流氓看见一游人的服装不顺眼,就会过去打他一顿。那里打伤或打死一两个人,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和林家五虎把天桥搞得几乎像座人间地狱,笔者接触过这些被判处死刑的恶霸的审讯记录,他们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身处重重压迫的天桥平民百姓,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养成了重义气、讲互助、敢于反抗的精神。天桥的平民文化,生长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之中,在这块污浊的土地上,却能蓬勃地成长起来,这真是化腐朽为神奇,有如美丽的荷花,出于污泥浊水,一朝开放,更加显得可贵。

三、天桥平民文化的发展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天桥平民文化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向前发展,始终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天桥曾三次遭回禄之祸,每次大火之后,很快又得复甦,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依托于平民大市场的天桥平民文化,是老北京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经历了去糟粕取精华的过程,天桥平民文化逐步在北京文化中构筑了自己的形象和地位。

(一)天桥文化艺术的升华。在天桥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成长了一批有艺术才华的民间艺人,在一些有识之士和文艺团体的扶植、帮助下,他们成为远近驰名的大师和艺术家。同时天桥平民社会包罗万象,充满各种复杂矛盾,也成为一些作家、艺术家汲取创作灵感的源泉。出人才、出作品是天桥平民文化的升华。

天桥的民间艺人,当年他们撂地卖艺时多数文化不高,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并与文化人结合,相互汲取营养,其中不乏有大成就者,如:语言艺术大师侯宝林幼时在天桥从云里飞、朱阔泉学艺,经长期艺术实践,形成自己特有的轻俏简捷、潇洒俊逸、庄谐并重的艺术风格,被誉为相声界一代宗师。他创作的《改行》、《戏剧杂谈》、《夜行记》等节目脍炙人口,成为相声艺术的经典之作,他还著有《谈相声的形式、结构、语言》、《相声溯源》等,被北京大学等校聘为教授,侯宝林从撂地卖艺,到登上大学讲坛,这是天桥民间艺人高度升华的一个典型。曲艺家魏喜奎幼年随家人在天桥卖艺,勤奋好学长期坚持奉调大鼓的革新,由于她在曲艺表演艺术上的高度造诣和创新精神,成为北京曲剧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发表不少关于曲艺表演艺术方面的文章。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年轻时即在天桥万盛轩、天乐戏院演唱,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演唱风格,被称做评剧的“新派”,她主演的《刘巧儿》、《花为媒》已拍成电影,著有《新凤霞回忆录》等,晚年努力总结艺术经

验,传授后人,并在绘画艺术方面做出成绩。

追溯作家与天桥的历史渊源,应该从曹雪芹说起。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所著《曹雪芹新传》中描述:曹氏家族获罪被雍正皇帝抄家之后,住到菜市口一个小四合院,曹家上年纪的老辈家仆领着曹雪芹“出了家门如果一直往西……就是地名天桥的所在。这地方极好玩,江湖卖艺的、耍刀枪的、卖药的、弹唱的、算卦的(占卜看相的),卖民间饮食特产的……闹闹攘攘,一片下层社会市民娱乐游玩气氛令人眼花缭乱。内城的高贵八旗人,是到不了,也不许到这种‘野地方’来的。雪芹初来时,大开眼界,也引起不少思绪。他感叹穷人为谋生路而必须承担的牺牲与苦难。也感到人的类别复杂万分:高的下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善的恶的……丛丛杂杂地交织在一起。”到了乾隆六年,宫廷的斗争再次牵连到曹家,于是曹家彻底破落了,曹雪芹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连串的家庭巨变,使曹雪芹开始怀疑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他尝遍了人间的冷暖,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突破了封建思想的羁绊,逐渐形成了叛逆的性格,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红楼梦》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一时期曹雪芹曾活动在前门外至天桥一带的戏楼茶园。他放浪形骸,以至到了衣食不给的地步,他和优伶来往,甚至偶尔也粉墨登场以自娱。他在和下层社会接近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生活体验,这些在《红楼梦》一书中都有所反映。

在当代作家中直接取材于天桥,进行创作取得很大成功的是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他的成名代表作《啼笑因缘》,写的就是发生在水桥的故事,照现在说法可称为纪实文学之作,要了解 20 世纪早期老北京生活的一个侧面,就还得看《啼笑因缘》,所以这本书今天尽管一版再版,还有很大的销路。

从历史变革的高度去写天桥的则是老舍先生。方从海外归来的老舍为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受鼓舞,他抓住了人民政府疏浚天桥龙须沟这条臭水沟,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这个生动的故事,以他的传神之笔创作了《龙须沟》,描述了苦难深重的天桥平民大众,如何

获得了新生，讴歌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部剧作一经在话剧舞台上演(后来又拍成电影)，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为此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老舍生前十分重视天桥，说它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并且曾自称是“东北贩药材商人”，住到天桥的小店中体验生活，老舍还为天桥的鸿兴楼写过一段相声，赞扬这家饭馆卫生搞的好。据说老舍生前还计划写三本书：《自传》、《八大胡同》和《天桥》。1965年老舍曾找天桥所在地北京宣武区主管街道、财贸工作的干部座谈，对天桥进行社会调查，并且告诉他们正在着手写一部小说《天桥》。至为遗憾的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老舍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有关天桥的笔记手稿在动乱中已经散失。不然的话他会像曹雪芹留下一部举世无双的《红楼梦》一样，留给我们一部文学巨著《天桥》和大量极有价值的资料。

今天，天桥再度成为文艺创作的热门题材，记者白夜出版了他的采访集《天桥》，作家蒋寒冰出版了《天桥演义》，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组织编印了《北京老天桥》画册和天桥史料集《天桥往事录》，北京天梦影视文化公司拍摄了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天桥梦》。天桥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丰富素材，而作家艺术家也以其作品为人民提供了美好的精神食粮。这种交流使天桥平民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区域文化——京味文化中的一味。作家艺术家在以天桥为主题的创作活动中经历了一个入俗——脱俗——更高水平还俗的反复循环，这就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结合升华。雅源于俗，因此艺术家必须入俗，从平民文化、俗文化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但对世俗生活及其情调绝非不分良莠的兼收并蓄，而是经过高度的筛选提炼”(吕智敏《化俗为雅的艺术》)，这可以说是脱俗，化俗为雅。所谓雅，也不是一味高雅，孤芳自赏，“雅人”创作，目的是给“俗人”看的，因此雅作必须还俗，回到自己的读者观众中去，做到雅俗共赏。如此不断地循环反复升华，促使天桥平民文化登上一个一个